

三部电影三个视角

对艾希曼的审判：人性、法律、哲学的拷问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文兵

阿道夫·艾希曼，纳粹德国的高官，负责执行了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的“最终方案”。他在这一“最终方案”中，负责向集中营运输犹太人，对600万犹太人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二战结束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随后逃脱，最后辗转流亡到阿根廷。以色列特工于1960年5月11日将其逮捕，并秘密运至以色列。以色列“开国总理”古里安决定对其进行公审，不仅是为了伸张正义，更重要的是为了让下一代也让全世界了解纳粹曾对犹太人犯下的暴行。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反人道罪等15条罪名起诉；这次审判也引起国际社会的注目，由于有不少的大屠杀受害者出面作证，以色列政府将艾希曼安排在防弹玻璃后面受审。艾希曼对其所有犯罪的指控，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艾希曼于1961年12月12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并被判处死刑，并于1962年5月31日被执行绞刑。艾希曼是以色列历史上唯一一个被法庭判决死刑的罪犯。

这里涉及的三部影片，都是对艾希曼以“执行命令”为其辩护时所做的拷问。不同的只是三种拷问分别采取了人性的、法律的、哲学的视角。

人性的视角：《世纪审判》

《世纪审判》(2015年)，是BBC为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而拍摄的，是以1961年对艾希曼的世纪审判进行电视转播为题材的电视电影。为了记录这次世纪审判，以色列方面成立了摄制组，并请来了著名导演里奥·赫尔维兹。里奥在二战结束后就拍摄了反法西斯的纪录片杰作《陌生的胜利》。他在摄制之初，有这样一个信念：不相信有什么怪物，那些创造法西斯主义的人也并不是怪物，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他在拍摄过程中，坚持要用一个机位近拍艾希曼，要从他的表情反应中，在他身上找到有着“丁点良知”的“真正的艾希曼”。但是，这种坚定的信念最后导致了他几近崩溃。4个月的审判过程，艾希曼面对15项罪名的指控皆以执行命令、不知内情为由加以否认。在庭审过程中，有112位幸存者与见证人出庭指控和作证，纳粹对犹太人所犯下的闻所未闻、惨绝人寰的残暴罪行一一被揭露出来，以致摄制人员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艾希曼一直面无表情。为此，制片人米尔顿与里奥发生了冲突。米尔顿希望这部纪录片所录制的是一个节目，因而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拍摄，而里奥则执著地盯着艾希曼。电影的高潮应该是在法庭放映纪录片《通往集中营之路》时。里奥要求在放映影片时，在法庭所有灯都熄灭之后唯有一束灯光照向艾希曼。但是，随着电影的放映，摄制组面对影片中惨不忍睹的画面都离开了机位，而艾希曼仍然没有任何的反应。面对艾希曼的冷漠，里奥在极度的震惊中，再也承受不了了：“你怎能就坐在那里？！你怎能不转过脸去？！”里奥相信，这些画面、这些控诉，总能“击垮”艾希曼，但最终，还是里奥自己被“击垮”了。里奥自认失败，也就是他没能找到阿道夫·艾希曼的“人性”。米尔顿则反问里奥：如果他本来就没有人性呢？里奥痛苦地回答说：“抱歉！我没法相信这点！那太糟糕了！”

里奥的悲哀在于他对人性的抽象看法。他相信那种与生俱来的“良知”，就如孟子所言的仁义礼智“四端”一样。里奥说，创造出了法西斯主义的人们并非怪物。这话，根本经不起推敲。就像人们说人性本善可又说明不了现实的恶如何产生一样。里奥忘记了更重要的一点：法西斯主义可以反过来改变人性！如果这种“主义”已深入到骨髓，你怎能让他存有那“丁点的良知”？

这里不能不说到海德格尔了。海德格尔在他 1927 年发表的《存在与时间》中，专门论及到了人的良知。在他看来，人们正是依此“良知”才把自己从沉沦在“常人”之中唤起。可是，这良知也只是从自身之中升发出来的，所以，这种“呼唤”也就是自己呼唤自己。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海德格尔对自己在纳粹上台后为迎合纳粹的所言所为，从没有认错和道歉。良知又何在？纳粹上台后，海德格尔于 1933 年 3 月加入纳粹党，不到 1 个月即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他在任期间多次发表演说，吹捧希特勒，称希特勒为德国的救星，宣称“德国民族的未来都系于元首一身”，要求大学的学生应该对“我们民族的救星”进行“效忠宣传”。此外，他还发表了不少排犹的言论。不少海德格尔的拥趸者为其辩护，声称他之所以迎合纳粹的主义是出于他的哲学信念。如果这种辩护成立，我们又岂能忍受这种“哲学”：它怎么能无视这种主义所导致的大屠杀与集中营？！这种抽象的人性，必将在这种疯狂的主义与固执的哲学面前被击得粉碎！

法律的视角：《艾希曼》

《艾希曼》(2007 年)，根据以色列官方审讯手稿(1960 年—1961 年)改编。以色列当局在捕获艾希曼之后，并不想直接依靠档案证明或目击证言就将其送上法庭，而是先指派了警官阿夫纳·勒思上尉对其进行审讯。审讯长达 275 个小时，留下长达 3500 页的审讯手稿。

审讯一开始，艾希曼就声称，他只不过是高速运转的机器上一个微小的齿轮罢了。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对于各种指控，艾希曼的回应则是，要么自己完全不记得，要么根本不在现场，要么没有文件证明。这部电影用了较多的镜头展示了艾希曼在纳粹时期的各种活动。影片刻画的艾希曼，是一个冷漠、残忍、狡猾、自大的纳粹军官。这也预示了审讯艾希曼将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

审讯一开始，勒思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周围的亲友甚至认为，对于艾希曼加以审讯而不杀了他，那就是背叛了人民。因为以色列建国后还没有设立死刑，所以以色列民众要求直接送给艾希曼一颗子弹。艾希曼的审讯和审判，引发了以色列民众的抗议浪潮。勒思上尉也被抗议民众视为“叛徒”，他与其家庭都受到了各种威胁。同时，勒思上尉的父亲曾被艾希曼直接签发命令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的事实也即将被曝光。这也就意味着勒思上尉能够审讯艾希曼的时间不多了，因为作为受害者必须回避这样的审讯。近 7 个月的审讯，勒思上尉耗尽了心力，每次快要抓住艾希曼的时候，他都溜掉了。就在勒思几乎快要崩溃时，艾希曼对与其上司希姆莱之间关系的极力回避，引起了他的注意，也成为审讯的一个突破口。

勒思向艾希曼宣读了另外一个纳粹高官在受审时的供述：“艾希曼蔑视希姆莱关于停止杀害犹太人的新命令，宣布将所有的犹太人以及他们 10 岁以上的儿童都发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的毒气室。”对此，艾希曼极力否认，宣称他决不会违反命令。勒思展示了艾希曼亲自签署的命令。艾希曼被逼到了死角！这也就宣告审讯的结束，终于找出了可以彻底“击垮”艾希曼并非都是“一切依命令行事”的证据了。被击败的艾希曼，最后只是希望勒思转交给自己孩子们的信。艾希曼流着泪，声称很爱自己的孩子们。勒思质问，你这样爱孩子，为何却把 50 万的犹太儿童送进了集中营？！艾希曼的回答是：因为是犹太人！

电影最后有一段勒思上尉真实的录音。这段录音让人警醒，值得在这里抄录。他说，对艾希曼的审判，“完全改变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比如相信真正的民主，只有它，才能从艾希曼这种人手中挽救人类。周围潜在着许多艾希曼式的人物，但艾希曼这种人，只有在专制制度下才会生长，而专制绝不会有民主。要维护民主，我们必须尽全力避免类似事件发生，防止新的艾希曼再次产生。”

哲学的视角：《汉娜·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2012 年)，主要讲述的是旅居美国的著名犹太女哲学家阿伦特受《纽约人》邀请，为艾希曼的审判进行撰稿进而引发争议的过程。影片就是以艾希曼在阿根廷被诱捕开始的。她之所以参与和研究艾希曼的审判，是要去验证她多年对“恶的本质”的思考，要看看艾希曼这个“活生生的”典范。

阿伦特本身就是一个纳粹的受害者。她在 1933 年曾经受到盖世太保的拘捕，最后流亡法国。但是，到了审判现场，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艾希曼尽管罪行令人发指，但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可怕，并不是那种有着邪恶动机与凶狠性格的人。她说，艾希曼始终以一种官僚体制的腔调在说话。艾希曼声称，他只是在遵守命令，没有自己“丁点的意图”。而遵守命令则是这些官僚系统成员的所谓“品德”：“每个官员都曾在就职时候宣誓，谁要是违背了誓言，他就是卑鄙小人。正如我站在法庭上，宣誓来讲述实情一样，在任何时候，誓言就是誓言。”这一声称，强烈地触动了阿伦特。

阿伦特就是在艾希曼的审判中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这种“平庸之恶”，表现了罪犯自身全面缺乏判断能力。她对这样的恶，有这样的描述：这种平庸之恶，因为没有通过思考获得，所以它就是没有深度的，进而能够“像表面的真菌一样”蔓延与传播。艾希曼就是这种“平庸之恶”的体现：他拒绝思考，拒绝自己的个性！

阿伦特这里提到了“思考”。可是，这思考，就是当年她的情人海德格尔教给她的。电影中多次出现她回忆中的海德格尔讲述“思考”的镜头。海德格尔向纳粹宣誓就职之后，阿伦特一直感到胸闷想吐。1950 年后，阿伦特曾对海德格尔说：“我无法想象教给我思考的这个人，竟然会做如此傻事。”海德格尔则这样回复：“我知道那个时代对你来讲是多么地艰难，到处是险境，无以依靠，无法还击。对我来说，其实也不轻松。”海德格尔坦承：“在政治方面，我既没有天生具有的才能，也没有信手拈来的能力，但从中已让我学到不少，并且我还想再学更多。当然，也不会把思考丢弃掉。”阿伦特继续追问：“但你为什么不对此进行一个公开的解释呢？”可惜的是，在电影中这段对话就此终止了。海德格尔何以不道歉，在思想史上本身就是一个谜，所以电影也无法接下去了。但是，就在这个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阿伦特的政治科学与海德格尔纯粹哲学之间的差别。尽管海德格尔对阿伦特思想影响巨大，但是，阿伦特最终还是以海德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者出现的。在她看来，在海德格尔那里，单个人自身被视为真理的处所，形成了与虚假的社会整体的对立。因为他拒斥“常人”习以为常的世界，实际上就放弃了人之为基础，而这最终导致对人性在实践上的否定。阿伦特暗示，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使人们对野蛮的罪恶毫无抵抗能力。海德格尔的这个“思考”再一次显得抽象。关注海德格尔哲学的人都知道，他的这个思考，就是一个无须知识的一种思考，不是基于理性的思考。没有知识的思考、没有理性的思考，又是一种什么思考呢？

阿伦特在《纽约人》上的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她遭到了犹太世界的严厉谴责。这一谴责，主要是针对她对二战时的犹太人委员会领导机构的指责，认为他们是法西斯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帮凶。至于她提出的“平庸之恶”，也引起一些误解，被认为是对艾希曼的辩护。事实上，阿伦特并不认为不应当处死艾希曼。但是，如果我们撇开艾希曼是否有个人的故意或自己的判断这样的具体问题，阿伦特为我们指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恶”，这应当是她对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的审判引出的是以往的法典中尚无规定的罪行，引出的是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之前尚无概念的罪犯。当她提出这个概念时，根本不是要为艾希曼辩护，而是尝试去理解这种“恶”。当我们再看一位法学教授并担任宪法法官的哈德·施林克所著的《生死朗读》（1995 年）一书及根据其改编的电影（2008 年）时，我们对这种“平庸之恶”就可能更好理解了。《生死朗读》中的汉娜，只是一个普通的纳粹集中营的看守，甚至还只是一个文盲。因执行上级命令而被判犯有罪行时，汉娜反问法官：“换了您，又会怎么做呢？”她绝不认为自己也是有罪的。

三部影片，虽都是纪实风格，并融入了当时的庭审录像等纪录片的片段，但毕竟是经过编剧、导演等再创作过的，自然有他们的观察角度和独特理解，因此，我们不必追究影片是否真实再现了那个审判与审讯，也不必追究影片是否反映了真实的艾希曼。对真实的探求，是史学家的事。影片如能给我们带来思考，那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况且，影片也不是纯粹的编造，而是以一定事实为根据的。